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9.005

邱卫东:“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与中国策略”,《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47-58页。

QIU Weido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l Limit and Chinese Strategy”, *Pacific Journal*, Vol. 26, No. 9, 2018, pp.47-58.

#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在限度与中国策略

邱卫东<sup>1</sup>

(1.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0237)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已越来越成为相互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而言,该局面的形成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分布格局和运行态势有着本质关联。这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现实历史进程会与经典作家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研判发生了重大偏离,也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认清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存在的诸多矛盾挑战。通过对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机理和内在限度的综合分析,将有助于我们通过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搭建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全球公共物品供给能力,以及夯实自身战略防御力量等多种举措,来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

**关键词:**资本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中国策略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8)09-0047-12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sup>①</sup>。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明确提出要通过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作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重大历史性论断,学界已分别从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角度专

门或综合地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从科学社会主义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社会制度及其相互关系来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知到:曾几何时,《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所必然要求的“革命斗争”而不是“和平发展”,“激烈对抗”而不是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指导

收稿日期:2018-03-10;修订日期:2018-07-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困境:历史根源及当代启示”(17YJC7100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邱卫东(1979—),男,浙江安吉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经济哲学。

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81页。

我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主导性认知。以至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提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所谓“三和”理论后,日益被视为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因此,本文将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全面揭示当下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其在当下呈现出怎样的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对我们在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有哪些启示。笔者以为,对上述这些基本问题的总体把握,无疑有助于我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去更好地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机理及其历史边界,更好地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机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是推动构建新时期外交的重要指导。但就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而言,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列宁当年“充分地运用《资本论》的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的过程中”<sup>①</sup>得出的《帝国主义论》,曾明确断言: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和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是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sup>②</sup>,并发出了如《共产党宣言》那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者的号召。但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与革命,“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却日益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为什么会从《帝国主义论》到“和平与发展”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其背后有无必然的历史依据?若有,其是否与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根本一致?显然,在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首先澄明的基本问题。

通观《帝国主义论》我们发现:列宁通过对

其所处时代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特征的分析,提出高度社会化生产背景下的“垄断”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国家的实质性支配,使得原本只是局限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间的矛盾对立,开始被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复制扩展至类似俄国这样的边缘落后国家。

所谓“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对立,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撰写《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再到《资本论》三卷,毕生探究资本内在奥秘的马克思发现了以私有制为核心、以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为根本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如 $(1+M)^n$ 那样促进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几何级增长和社会文明的质向提升,因而也是人类社会“新时代”<sup>③</sup>来临的重要标志。但与这种巨量“资本积累”以及社会文明进步提升相对应的,是在此过程中同时生成的“贫困积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私有资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吸取劳动者的“人的自然力”,并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资本。为此,私有资本必然会在总体上最大程度地压低劳动者的收入,从而必然在资本积累最大化的过程中产生经济上的贫困积累。作为这一矛盾对立的历史现象,则是整个社会必然因消费不足而产生过剩性经济危机。(2)资本竞争性地汲取“自然界的自然力”,并最大限度地将其转化为资本。这必然会因在总体上过度损耗公共与环境资源,而导致公共资源与生态环境上的“贫困积累”。生态危机由此生成。(3)资本竞争性地汲取社会劳动组织中的“社会劳动自然力”,并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人在生命的社会发展空间上

① 转引自侯惠勤主编:《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马克思主义著作精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的“贫困积累”以及相应的人的发展危机(即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sup>①</sup>也由此形成。

正是基于“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这一关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结构的分析,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更高形态的人类文明类型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在他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一种应然的理想,有且只有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矛盾发展到必须要用社会主义这一方式来解决的时候,旨在克服资本悖论的人类新文明类型才会在问题倒逼式的情境下发生。可以说,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认知,也是马克思生前始终注意与那些同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几种人们划清界限的根本原因。

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趋向缓解且并未如经典断论预设那般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尴尬境遇,第二国际内部一时不知何以在理论上做出应对。关键时刻,列宁在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和布哈林(Bukharin)《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研究基础上,敏锐地发现当时的资本全球积累机构“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sup>②</sup>。不仅如此,相比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在类似八小时工作制、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福利保障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积累”威胁减缓,以及快速蔓延的无产阶级意识日益淡化,改良之声压过革命诉求的这种“特别可恶”的“机会主义”<sup>③</sup>而言,当时被卷入资本全球扩张体系的东方落后国家,则依旧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法则下,遭受舰炮政策的强制性洗礼。

这促使列宁在“充分运用《资本论》的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所得出的《帝国主义论》中断言: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上述特征,意味着原本只是局限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矛盾对立已经被复制扩展到边缘落后国家。这也意味着这一生产方式已经

进入了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而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所谓最薄弱,即相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地区成建制的资产阶级力量最为稀薄,同时这里劳苦大众受奴役压迫的程度却最高),可以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来点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sup>④</sup>。十月革命的爆发,历史地顺应了资本全球扩张时代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然,在此过程中,倘若结合历史过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sup>⑤</sup>的实际,我们也必须承认下述这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已被马克思列宁觉察,但受制于时代限制却未能全面深入论述,而在他们逝世后变得日益清晰的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事实: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面对本质上由资本最大限度地吮吸“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社会劳动自然力”而造成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不得不在问题倒逼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通过福利改革、环境立法、社会保障、金融创新、产业升级等途径,全力克服经济社会发展危机。从而出现了如《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言的那种“外在缓和与实质性紧张有之,试图用和平手段处理畸形关系也有之,劳资双方边界界定十分模糊更有之”<sup>⑥</sup>的复杂现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逐渐开拓出了一条既能填补巨量制度成本从而化解国内危机,又能确保资本积累逻辑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畅运

① 马克思提出过三种自然力:作为劳动力的“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702、443、387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③ 同②,第102页。

④ 关于《帝国主义论》核心内容和内在分析逻辑的具体论述,参见邱卫东、胡博成:“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困境:历史根源及当代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⑥ 参见张雄:“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哲学研究》,2006年10期,第30页。

行的“有效手段”。

具体而言,借助于全球交通革命和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的荣光,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开始从马列时代舰炮政策下的野蛮殖民掠夺,逐渐转向通过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产业链分布形态上的“两头在内”(即将具有高附加值的研发和销售环节掌控在自己手中)、“中间在外”(即将低附加值的基本加工生产环节转移至由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来完成)的文明化态势<sup>①</sup>,从而“文明”地将众多边缘落后国家局限在“三低”(即低工资低效益低福利)和“三高”(即高消耗高事故高污染)为典型特征的中低端发展阶段上<sup>②</sup>。这一态势与那些铺天盖地的国际传媒和教育体系的话语管道<sup>③</sup>交相呼应,愈发有效地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编织进有利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符咒。

作为客观结果,一方面,这种态势确实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迈向高端产业开辟了空间,并使其仍能在“以资本为本”而不是“以人民为本”的过程中,凭借自身在长期资本积累中沉淀积累起来的经济、科技、军事以及话语权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汇率、利率变动,制造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引导资本流向,控制大宗商品定价权甚至有意转移金融泡沫和有毒金融资产等方式,来“文明合法”地开动资本积累的机器,继续畅通无阻地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带获得资本增值的饕餮盛宴。因此,尽管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了二战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程度并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全球积累的上述格局确实存在,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化解国内贫困积累矛盾的筹码更为充足,整个社会也日益呈现出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国力强盛、民主进步、社会和谐并逐步迈向福利社会与消费社会的文明景观。从而直接导致了列宁“希望欧洲国家快速进行革命的预见只是一种空想”<sup>④</sup>。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

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确实在“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sup>⑤</sup>。另一方面,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当然也包括在十月革命精神指引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而言,无论是出于自身现代化还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条件<sup>⑥</sup>,都开始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引进吸收国际资本,逐渐融入并参与了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诸多发展中国家仍须在类似“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全球产业链格局中,为自身寻求更为有利的发展机会。从而为自身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奠定前提基础。就此而言,在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巨大波折”后,对内通过探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进而决定性作用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通过不断扩大开放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管理和技术,实现产业结构及创新能力不断完善升级,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融入国际体系更为深入,综合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显著增强,即是对我们在这一体系中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能有效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发展

① 具体参阅[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等译:《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

② 可以说,拉美国家在经历这种性质的发展后所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低收入陷阱”,乃至包括当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的强烈地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忧患,就是这种发展形态实质性存在的最好证明。

③ 改革开放以来为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中心论、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就是典型反映。

④ [俄]E.普里马科夫著,班婕译:“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3期,第84页。

⑤ [美]大卫·哈维著,胡大平译:《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⑥ 按照“两个绝不会”理论,在贫困积累威胁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边缘落后国家,确实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初步积累起能与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相抗衡的社会主义物质力量后,进一步在世界体系中发展社会主义所需的“物质条件”。否则就无法及时有效地借鉴占有为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关于边缘落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践行社会主义所须经历的发展阶段的具体论述,参见鲁品越:“国际体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两大阶段”,《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第130-140页。

本国现代化的最好证明。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和平发展”<sup>①</sup>而不是如经典作家早期预判的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殖民热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正式生成。

## 二、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限度

基于对资本全球扩张不断走向深入过程中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下所要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事实性研判,也是关于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追求。康德(Immanuel Kant)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认为,人类终极的目的乃是追求达到最完美的国家制度,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应当揭示人类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曾经接近或者离开这个终极目的到了什么地步,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应该做什么事情。倘若对照此来反思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则必须看到其中存在的两大矛盾现象。

一方面,资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确实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正如马克思在赞誉资本主义文明时揭示的那样,这种本质上以发现、制造进而占有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模式,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确实促使人类社会成功摆脱了“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sup>②</sup>,而且与以往任何社会相比,这一社会形态“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③</sup>,是人类社会“新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因此,对于世界上那些无论出于发展现代化还是践行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需要,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边缘落后国家来说,确实在资本全球产业链上通过明显区别于殖民热战时代的和平发展形态,解放和发展了本国的社会生产力,并由此获得了程度不等的走向现代化的机会。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依赖地缘政治、区位优势以及国内改革等多种因素,还取得了诸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般的生产发展、科技进

步、文明提升、福利改进的历史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于世界体系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在这一命运共同体中进行的生产和发展必须以基本上不影响妨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获利为基本前提。否则,势必会因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一些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对既有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冲击,遭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牵制阻挠。这已一再被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讲,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作为现代“文明标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既往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综合实力,确实在资本全球积累的结构格局中占得了总体上优势。因此,面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存在的矛盾现象,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弄清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作为深层原因,那些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获利的因素是怎么生成、又是怎样现实地影响到既有资本全球积累格局的;第二,作为普遍现象,这些因素的出现总体上对已经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三,作为典型反映,这种影响在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有哪些鲜活典型的展现。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无疑对我们全面把握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进而在坚定追求人类新文明类型的信念中探寻方案对策具有重大意义。

### 2.1 当代资本全球积累结构中生成的否定性因素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既有的明显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盈利的资本全球积累格局中,一些霸权国家通过垄断全球产业链与金融链并实行经济虚化,导致其整个

①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高度承认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判断的远见卓识。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国民经济在大幅度脱实向虚的过程中,减少了本国制造业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以美国为例,自21世纪以来,虽然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态势,但其金融资产却占到了世界总量的40%左右<sup>①</sup>。这种主要倚赖财富分配环节来瓜分全球范围内剩余价值的所谓金融创新,使得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来满足其消费与扩张需求的财富来源,越来越具有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揭示的那种寄生和腐朽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在根本上不利于既有的资本积累结构稳定运行的内在否定性因素。

一是本国制造业工人的失业和劳动创新能力的衰退。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金融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的号角下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国内产业资本的全面性碾压,使得西方制造业遭到了空前挤压,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中低端产业外移现象。由此形成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浪潮,不仅形成了诸如“2008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企业平均利润增长6倍,但制造业企业平均利润仅增长20%”<sup>②</sup>的巨大反差,同时还导致了无数工作岗位消失和收入减少以及劳动创新土壤发生空间转移的局面。由此而来的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使得20世纪50年代开始盛行的库兹涅兹设想日益被事实上的托马斯·皮凯蒂曲线<sup>③</sup>所证伪。

二是实体经济规模在整个世界经济份额中的总体性衰退。就作为实体经济代表的制造业而言,全球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所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进一步“从1997年的19.7%降至2015年的15.3%”<sup>④</sup>,这其中,加拿大、丹麦、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尤为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则进步一扩大。以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其自“2010年开始制造业总产值已位居世界第一位,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已占到全世界总量的25%”<sup>⑤</sup>。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显示,刨除服务业不计,2001年美国实体经济的总量是中国的

3.47倍,2015年中国的实体经济总量已是美国的1.3倍。

三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使得本国制造业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开始挤占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市场份额。以中国的高科技产品贸易发展为例,在被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的名录中,生命科学、光电、生物、电子、计算机与通讯、材料、航空航天、计算机集成制造等技术产品自2004年首次出口超过进口,成为了高科技产品贸易净出口国家,出口规模达1654亿美元,2013年为6603.3亿美元。这其中尽管大多数高科技产品严重依赖外资,如2013年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由外资主导的比例占到了73%,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自主创新水平低,有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品牌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少的现象依然存在<sup>⑥</sup>,但结合现代化规律和近年来中国推动创新发展的既有成效来看,这一发展成就值得肯定。

## 2.2 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的总体反映

存在于当代资本全球积累格局中的系列内在否定性因素,使得我们再来分析研判当下这一已经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必须在总体上看清下述两大本质关联、内在贯通的总体态势。

首先,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推动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在资本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入过程中生成并日益呈现的上述矛盾意

① 杨承训:“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阶段性特征”,《海派经济学》,2010年第1期,第29页。

② 孙振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92-96页。

③ 关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如库兹涅兹曲线所预测的那样走向缓和,而是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那样出现了巨大分化的论述,参见申唯正:“贫富差距何以大幅拉升?——对皮凯蒂曲线背后历史事件的再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9期。

④ 彭翔、张敏文、郭文松:“世行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建议”,《中国财政》,2018年第1期,第80-81页。

⑤ 佟家栋、谢丹阳等:“‘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第5-59页。

⑥ 陈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4期,第39页。

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模式上已经进入了最高和最后阶段。但在此过程中, 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积累的地位优势仍在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向边缘落后国家转移贫困积累的矛盾, 使这些国家确实具备了“腐而不朽, 垂而不死”的客观条件。结合资本全球扩张的本质要求和演进历程也可进一步断言, 只要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国际资本拓展的空间, 只要既有的游戏规则依然能在这些空间中起决定性作用, 那么既有的资本全球积累格局就仍能延续下去。

其次, 与上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总体态势中的发展特征和应对举措相对应, 由于一些霸权国家并不从根本上反思自身“赢者通吃、两头通吃”<sup>①</sup>的资本逻辑并从中寻找克服化解的办法, 恰恰相反, 他们继续利用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实力来强势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平衡, 这使得近年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贸易、汇率、货币以及金融战等一系列“没有硝烟的战争”, 已越来越成为我们常见的高频词。据不完全统计, 从2000年到2014年,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共计638件, 占全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在欧盟有效的73项反倾销举措中有56项是针对中国的<sup>②</sup>。2016年12月与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满15周年之际,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所规定的内容, 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西方国家一边享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的巨大红利, 一边继续按资本积累结构的既有思维维护一己私利的局限性昭然若揭。更有甚者, 他们还会通过发动局部范围的热争来达到维护霸权的目的。以头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 在1916年-2008年期间, 由其参与和发动的战争次数总计达到了220次, 平均每年就会发生2.5次。<sup>③</sup>

可以说, 在这种本质上“并没有超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和阶段”<sup>④</sup>的资本全球积累格局中,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资本逻辑及其内含的对抗基因、利己主义基因和扩张基因, 在

当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广泛而深入地存在着。这无疑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地区设置了严峻的结构性障碍。

### 2.3 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的典型表现

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 以及作为新兴大国代表的中国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挑战, 即是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的鲜活展现。

第一, “逆全球化”潮流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的展现。值得注意的是, 对比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几次反全球化运动, 这次行动的主角居然是曾经大力推行全球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初看起来, 其初衷主要表现为这些国家的政党在争取选票的压力下, 积极响应本国部分民众的需求, 通过公投或立法的形式打破国际间既有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框架, 强制性地为本国产业工人讨回被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抢去”的就业机会。很多人因此也将其看成是民粹主义的表现。但若结合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的结构特征来看, 这一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 实际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即往获利模式有着本质关联。既往的模式通过金融资本和国际产业链攫取他国廉价劳动力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 但同时国内财富分配却严重不公。因此, 这一轮“逆全球化”绝不是这些国家要脱离全球进行孤立发展。恰恰相反, 它是一些霸权国家在既有思维框架下既想通过以往的霸权主义继续在国际体系中得到好处, 但却又拒绝为此付出相应代价的应激性行为。其相应举措, 就是通过修改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规则, 为自己在新一轮的全球布局中

① 丁晓钦: “逆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基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年第10期, 第98页。

② 转引自李景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 第9页。

③ 转引自辛向阳: “列宁的‘帝国主义腐朽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理论研究动态》, 2009年第2期。

④ 参见刘儒: “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发展”, 《红旗文稿》, 2016年第5期, 第20页。

争取更多有利砝码。这也决定了这轮逆全球化只可能是较为短暂的过渡阶段。其历时长短取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化既有资本积累结构的系列内在否定性因素、进而重新确立对已有利的获利模式(资本全球积累结构)所需要的时间。这意味着相关国家和地区会在更高更新的阶段上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博弈。无论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还是通过设置议题盘活矛盾存量来激发一些地区的“局部热战”,将成为接下来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大概率事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此轮国际角力中总体上实现了自己的诉求,将意味着当前历史背景下“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结构升级版的形成。这势必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冲击。

第二,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挑战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限度的展现。这一挑战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必然表现。实事求是地讲,当今美国的经济不能离开中国市场,因为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垄断资本,必须要持续不断地依赖吮吸全球剩余价值,才能实现其不断扩张的内在要求。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无疑是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剩余价值的最大源泉。因此,美国希望将中国永远固定在国际产业和分工链条上的中低端,通过制定对已有利的贸易政策和规则限制中国发展,以此来维护其霸权地位。在满足霸权条款的前提下,美国愿意并且非常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贸互动关系。但问题在于,现如今中国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正通过创新发展与产业转型不断逼近全球产业链高端,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试图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通过自贸区、亚投行和人民币离岸结算试图部分摆脱美元霸权。在此背景下,代表美国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强硬派必然想方设法围堵中国,从而在造成中国周边区域紧张动荡的一系列不确定性中,诱导资本不断流出中国。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是依赖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

际话语体系,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规则等“软实力”,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形成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第二是靠他的“硬实力”,体现在至少两个方面。其一是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今年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企业七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信元器件,即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国家试图封锁中国向当代网络通信技术高地进军从而维护自身霸权利益的典型表现。其二是倚赖强大的军事实力。自奥巴马政府任期末以来推行的“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典型反映。特朗普上任以来强调“美国优先”,并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便是通过“软实力”和“硬实力”软硬皆施,对中国形成巨大围堵压力的鲜活教材。中国能否成功跨越因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这一陷阱,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诸多半中心一半边缘大国能否克服既有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进而带领本国人民追求并实现美好生活的试金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中美两国间的矛盾绝非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这是由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结构决定的基本矛盾在全球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展现。

综上所述,当今世界从整体上看确实成为了“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我们仍可以在资本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断言,当前的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尚处于其发展运行阶段的1.0时代上<sup>①</sup>。既有资本积累结构中生成的和平发展与各种形式的战争冲突相互交织,合作共赢与各种形态的明争暗斗随处共存,以及由此而来的广大人民群众试图改变不合理格局的诉求前所未有,同时金融动荡、贫富分化、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等挑战变得愈加突出,则是当代人类命运

<sup>①</sup> 这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0时代”,特指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情境和语境下,根据前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机理和内在限度的分析,得出的关于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阶段的概括性表述。第三部分关于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是对这一表述的具体回应。



共同体在其1.0时代高级形态上的主要特征。而这,也在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当今各国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空前加深”的过程中,违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依旧广泛并存的历史根源。

###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策略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①</sup>。基于对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机理及其内在限度的分析,笔者认为:当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来共同推动构建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sup>②</sup>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无疑是当代中国在直面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发展困境时提出的旨在化解全球范围内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这一基本矛盾的中国方案。这一在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入过程中接续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而来的历史性方案必然具有下述几大要求。第一,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动力,不是国际资本霸权,而是各当事国的人民为自身福祉而发展全球化生产力的共同需要。第二,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础,不是强加于世界各国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各国人民在日益深入交往和紧密联系过程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起来的“共同价值”。第三,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不是那种不平等的国际产业链和金融霸权的国际金融链,而是通过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原则由相关国家共同建设并将各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交通纽带、能源纽带、经济纽带与文化纽带。第四,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军事基础,不是发达国家的军事霸权,

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制。可以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所内含的上述要求,本质地规定了当代中国必须重点做好下述几大方面的工作。

#### 3.1 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升本国产业链的全球布局能力,以此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基础

2016年9月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后,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由此计划凸显的新工业革命时代的特征,主要彰显为产品的制造地已不再集中,而是广布全球;工业革命的影响也不再局限于主要发达国家,而是遍及全球;数量越来越多的制造商正通过“外包”、“众筹”、“互联”等广为世人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将制造业链条混合嵌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众多在科技专门化、生产营销网络和生产方式细分中衍生出来的“静脉”行业,越发将整个世界连为一体。在这一历史趋势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在及时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通过提升本国产业链的全球布局能力,不断提升自身对外交往的质量和水平。在这一点上,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理念举措,都本质地契合了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 3.2 积极搭建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各国人民传达当代中国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举措

近年来,以服务并实现自身在全球范围内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sup>②</sup>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59页。

的资本增值为根本要求的国际垄断资本力量,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通讯和传媒技术,通过遍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国际评价标准”,及对全球范围内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垄断权,不断将中国在新时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探索实践如“一带一路”倡议等解读为“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试图以此来根本否定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追求人类新文明类型的合法性。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Ken Lieberthal)所言:对于“一带一路”中一些雄心勃勃的项目,我们更关心它们是“根据什么标准设计和规划的,是否是根据政治上的考虑设计和规划的”,其金融、环境和劳工标准是否清晰明确且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相反,“如果中国对这些关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就会导致大家的怀疑和不信任”。而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iev)看来,“在一带一路问题上,中国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是双赢互惠的,并还要辅之以更多的细节说明”。<sup>①</sup>因此,这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诸如孔子学院、学术研讨、文化交流以及网络媒体等各种渠道平台,将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的和合文化,以及作为这些思想在新时代集中表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用明确区别于资本逻辑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

### 3.3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切实形成有利于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格局

自二战以来,为尽快建立起应对防范世界范围内危机的处理机制,一系列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国际组织应运而生。综合来看,这些举措确实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些制度准则在既有的国际政治力量分布格局中,仍主要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及诉求,资本逻辑中内含的“丛林规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基因以及由此而来的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赢者通吃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近年来出现的联合国改革呼声很高但进展缓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应付日

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动荡;多哈回合谈判无法弥补日益明显且不断扩大的世界贸易体制中的裂痕;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和规则引起很大的争议;国际社会尚缺乏处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共识;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虽经多轮谈判却远未建立良性的全球合作运行机制等问题,都是现有治理体系局限性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反映。其直接后果,就是诸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sup>②</sup>。

因此,作为世界体系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既要维护现存合理国际秩序和准则的坚定维护者,也要联合新兴经济体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走向更加公正合理<sup>③</sup>。近年来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亚投行,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迈出的重要步伐。当然,由于国力所限和一贯坚持的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再加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乃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要求,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国既没有必要与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陷入霸权之争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可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规则进行根本性变革。相反,我们必须在“认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优势”的过程中,“在时机上保持历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既不要因一时一事或一城一池得失而自乱方阵,同时也要“避免盲目向‘左’转或向‘右’转”<sup>④</sup>的极端情况发生。这也是我们在统筹好国内国际两大关系中保持战略定力的

① 本刊编辑部:“关于跨太平洋安全架构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现代院论坛2015’发言摘编”,《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9页。

③ “习近平:金砖国家要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新华网,2017年9月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04/c\_129695717.htm。

④ 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21页。

应有之义。

### 3.4 提升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 从而在充分彰显共建共享的过程中, 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认同

按照价值的本质属性和作用规律来看, 要将某种价值追求转化为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的信念追求, 除了要做好理论层面的宣传和引导外, 还必须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和地区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为此, 当代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 一定要充分彰显共建共享的原则。体现在整个国际层面上, 就是我们既能全力以赴、又量力而行地承担自己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相应责任。在诸如联合国会费、国际维和、国际援助、相关基金组织以及事关全球治理的政策供给方面, 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就此而言, 当前某些国家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话语权, 很大程度上与其掌控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分配有着深度关联。

当然, 这一要求的有效实施, 无疑要求我们以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作为前提保障。其中的核心关键, 就是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 不断通过创新发展实现自身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跃升, 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以及引领人类发展的理念与价值层面有效提供全球优质公共物品<sup>①</sup>, 有效克服“全球和地区层次上因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短缺所导致的比比皆是的国际治理失灵”<sup>②</sup>现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在新时代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走向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也将是我们同步全面提升全球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的历史过程。

### 3.5 夯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的战略防御力量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现实挑战清楚地告诉我们, 虽然其前景光明, 但这一过程

必将要经历极其复杂的伟大斗争。这其中, 必将与强大的国际资本力量相抗衡以及面临由此而来的大国间的博弈, 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结合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 以及和平发展时代系列“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时刻伴随, 并联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被重新激活的各种矛盾挑战, 我们必须在坚持上述四大策略的基础上, 认知到当下所要深入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政治军事基础绝不能是像霸权国家那样在各国建军事基地、通过军事结盟制造“保护国”与“假想敌”间的国际对立来维系, 而是必须在根本上依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来走向善治; 同时也要认知到必须适应世界新军事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的需求, “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 并按照“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sup>③</sup>的战略要求, 来真正担负起这个伟大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任务。

笔者坚信,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资本逻辑内含的对抗基因、利己主义基因和扩张基因在不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威胁中得以日益清晰地彰显; 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 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的历史时代的来临; 加之当代中国在面对当前这场“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伟大斗争中, 不断探索克服资本悖论、追求经济正义、实现民富国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实践, 都意味着不断走向智能化时代的人类社会必将在问题倒逼和既有成功实践的历史情境中, 引导、促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日益朝着“更好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 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

① 关于全球公共物品所应具有内涵的表述, 参见蔡拓: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 《学术界》, 2016年第9期, 第9页。

② 刘雨辰: “从参与者到倡导者: 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变迁”, 《太平洋学报》, 2015年第9期, 第80页。

③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 第54页。

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重要标志。  
意愿和利益”<sup>①</sup>的全球治理体制迈进。如此时  
刻的到来,也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2.0时代

编辑 邓文科

##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l Limit and Chinese Strategy

QIU Weidong<sup>1</sup>

(1.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speed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and regions characterized by both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are becom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formation of this situation is essential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overty accum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t is not only the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deviations from classical writers' visions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world, but also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nternal limi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ill help us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we must further enhance our ability and level of opening-up, build a platform for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promote the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enhance the supply capacit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consolidate our own strategic defense force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great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apital globalization;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ternal limit; Chinese strategy

---

<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4-275页。